

## 「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

吳政緯\*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明清史家初次「邂逅」朝鮮文獻的歷史。中國第一代的明清史家自1920年代以降開始注意朝鮮史料，重要史家如孟森、吳晗、李光濤等人更傾注心力盡讀《朝鮮王朝實錄》，展開各自的研究。他們重視朝鮮文獻源於兩個關鍵因素，一是清朝統治遺留下的歷史問題，一是日本東洋史家的朝鮮研究成果。兩股力量的交匯，內外合力，朝鮮從此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

本文首先梳理清朝文化政策的影響，次而探論日本東洋史研究對中國學人的刺激。清朝統治者透過幾種方式，造成清代讀書人對於特定的歷史議題，服膺官方預設的標準。這個結構性的背景，致使民國初年的明清史家懷疑史料的真假，甚至認為清代的史料甚少，文獻不足徵。與此同時，日本東洋史學界大力發展朝鮮研究，累積豐碩的成果。中國史家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透過日本史家的著作將目光投向朝鮮文獻。明清史研究與朝鮮史料的結合，使當時的明清史家得以挑戰新的課題並造就孟森的代表作《明元清系通紀》。本文最後回顧1930年後的發展，直迄1960年代，呈現不同世代的明清史家如何理解朝鮮史料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明清史家、朝鮮史料、孟森、稻葉岩吉、《清朝全史》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Email: andorealer@gmail.com。

## 前言

歷史學家視哪些文本為重要的論據？這從來就不是想當然爾、不證自明的事。王汎森曾透過「內閣大庫檔案」、「殷墟考古」兩起重要事件，呈現出學者間截然不同的新、舊史料觀。例如甲骨四堂中的兩位：羅振玉（1866-1940）、董作賓（1895-1963）皆曾親往殷墟勘查，面對這個後人習知的重大成果，羅振玉卻感嘆「寶藏幾空」，董作賓則在寫給傅斯年（1896-1950）的信中表示，此項工作無甚意義，提議放棄。相形之下，畢業自哈佛大學人類系的李濟（1896-1979）直言考古現場潛力無窮，「觀之令人眼忙」。<sup>1</sup>

透過董作賓等人的例子，顯見今人眼中的「珍寶」也可能「棄之如敝屣」。而哪些文本被視為重要的證據，更且得以成為史學研究的話題，顯然涉及個人的學術養成，以及學者預期的研究成果與對話對象。在傅斯年、李濟的語境中，他們意欲提升中國歷史研究的水平，與西方漢學爭勝。中研院史語所唯一且最高的目標，自然是廣為搜集、整理「新史料」，援引西方「科學化」的操作方式，締造中國史學界的新式成果。

本文試圖深入另一次關鍵的「史料發現」，即 1930 年代中國的明清史家如何開始利用《朝鮮王朝實錄》及其他朝鮮古籍。當時中國尚無專門研究韓國歷史、朝鮮王朝史的學者，首先涉入這批資料的是中國第一代的明清史家。本文無意評價當時明清史家的成果孰優孰劣，或逐一檢視他們解讀朝鮮史料是否正確。關切的是為什麼他們注意朝鮮史料？為何給予朝鮮史料如此高的評價？哪些因素促使他們必須將目光從中國轉向域外？筆者嘗試釐清不同層次的因素，尋繹埋藏其間的心態與他們從事研究的難處。

中國最早接觸朝鮮史料的歷史學家，同時是中國第一代的明清史研究者，且為開創明清史研究的宗師，如孟森（1868-1938）、金毓黻（1887-1962）、李光濤（1897-1984）、謝國楨（1907-1982）、吳晗（1909-1969）、王崇武（1911-1957）等人。他們援引朝鮮人著述，撰寫書目介紹，其中幾位摘抄全書，並對勘中

<sup>1</sup>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2（1997），頁 93-132。

國文獻，展開他們的明清史研究。孟森更以使用朝鮮史料聞名於世，榮膺當時清史研究的桂冠。

目前對於中國如何開展「韓國歷史」、「中朝關係史」，或中國史家為何涉入朝鮮文獻的學術史回顧與討論，尚付之闕如。相形之下，日本、韓國學界的「韓國歷史研究」的史學史考察，已有豐富的成果。東京都立大學旗田巍（1908-1994）在戰後深切反省，強烈批判日本的朝鮮史研究，勾勒出日本政府的大陸政策，與朝鮮史研究之間的關係。<sup>2</sup>京都府立大學的井上直樹在前人的脈絡上，更細緻地梳理研究者的系譜、研究者對於「滿鮮史」概念的變化，並釐清若干史實的錯誤。<sup>3</sup>

韓國方面，韓永愚、朴仁鎬的研究則說明，韓國近代史學的序章，譜寫於朝鮮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角力之中。整體而言，日本殖民時期的韓國史家不滿意日本史家的日鮮同祖論、他律性論、黨派性論、民族性論等學說，透過新式的史學研究回應。<sup>4</sup>以他律性論為例，日本史家主張，韓國自古以來的發展，皆非倚靠韓民族的力量，而是受到中國、蒙古、日本的外力干涉，這顯然是符合日本殖民朝鮮的論述方式，徹底否認朝鮮半島上的人民具備自主獨立的能力。

那麼「朝鮮」究竟為何、如何在 1930 年代成為明清史家的重要話題？「朝鮮」究竟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受到廣泛地關注？朝鮮史料在他們的研究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少數涉及此議題的相關研究通常將原因歸諸：當時中國史家注重挖掘新史料，以及受到世局事變的影響。尤其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件之後，中國史家基於愛國熱情、關心政治，掀起一波研究東北

<sup>2</sup> 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觀》（東京：勁草書房，1969）。旗田巍，《戰後における日本の朝鮮史研究》（東京：「朝鮮問題」懇話会，1977）。另可參梶村秀樹著作集刊行委員会・編集委員會編，《朝鮮史の方法》（東京：明石書店，1993），頁 86-107。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內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合著，《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東京：刀水書房，2004），頁 19-61。

<sup>3</sup> 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

<sup>4</sup> 韓永愚（한영우），《한국민족주의역사학（韓國民族主義歷史學）》（首爾：一潮閣，1994）。朴仁鎬（박인호），《한국사학사대요（韓國史學史大要）》（首爾：以會文化社，2001）。

與邊疆民族的熱潮，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可堪代表；隨著深入此類問題，勢必牽涉到朝鮮半島。<sup>5</sup>

至於晚近論及孟森、謝國楨、吳晗等人的史學史作品，往往簡單帶過他們對朝鮮史料的關心，彷彿圖書館一購入《朝鮮王朝實錄》，他們便立刻了解、熟悉此一文獻的特色與價值，進而耗費數年的精力通讀、摘抄朝鮮實錄，未能深論中國明清史家的「朝鮮興趣」從何而來。<sup>6</sup>更重要的是，學界迄今未曾注意到中國明清史家關心朝鮮，實是受到日本東洋史家的影響，且一部分學者係為了與日本史家競爭而大量利用朝鮮史料。換句話說，中國史家翻閱「朝鮮文獻」既須考量內部因素的結構，也應審視外部刺激的衝擊。

本文旨在探討 1930 年代以孟森為首的中國明清史家，他們為何關心朝鮮文獻，並藉此展開相關研究。他們的對話對象是誰？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學術問題？以及在過去強調東北問題的影響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如後所示，追索中國明清史家的「朝鮮興趣」需考量兩個關鍵因素，一是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即清代官方的文化政策；一是相對短期發生的近因，即與日本東洋史的競爭。在內外合力的交互作用下，誕生中國第一代運用朝鮮史料研究的典範。

為了回答上述一系列的設問，本文將目光投向當時史家的書信、日記、題跋、史學專著與研究回顧性的文章。以下各節，首先將分析清朝文化政策的影響，呈現民國肇建以降，中國明清史家的學術關懷。其次梳理日本東洋史的發展，尤其是關於朝鮮半島的研究。廓清這兩種脈絡後，才得以探討中國明清史家的「朝鮮興趣」。最後簡單勾勒 1930 年代之後的餘緒，總結此項課題的意義。

<sup>5</sup>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第三章 民族：納「四裔」入「中華」〉，頁 75-109；王維佳，〈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之編纂與價值〉，《史學月刊》，2015：6（2015），頁 15-24。

<sup>6</sup> 鈔曉鴻，《明清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周佳榮，《明清疑案新探：史家的證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8）。

## 一、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其影響

活躍於 1930 年代的明清史家，除了少數幾位如王崇武之外，大多生於清季，其中不乏青年、壯年成長於清代中晚期者，如孟森、金毓黻。對於 1930 年代的學人而言，「清朝」是真實經歷過的歷史，清朝的統治及其影響並不久遠。在深入這群史家的研究之前，必須先總結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的影響，包含文字獄、禁書政策等意識形態控制，方能解釋 1930 年代明清史研究的話題從何而來。眾所周知，清朝統治者透過正史、政書、筆記彙編等一系列著作，建立「正統」的歷史知識。搭配禁抑異己的手法，消除可能危害清朝統治的言論，打造符合統治需求的歷史觀。<sup>7</sup>

所謂的清代禁書，廣義指的是清朝入關後直迄清末，所有官方明令禁燬的書籍，而學界慣用的是狹義，即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後的禁書，又稱四庫禁書。根據統計，禁書的數量約 3,000-4,000 種之間；<sup>8</sup>就結果而言，禁書顯然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從《四庫禁燬書叢刊》收錄的古籍，便能了解清朝官方無法徹底地根除數量如此龐大的出版品。然而晚近的研究揭示清代禁書的政策，如何深刻地影響清代中葉以降的思想文化。例如清代古籍時見有目無文、塗抹條文的情形，作者避而不寫、自我審查、不願出版的情事亦時有所聞。這種「自我壓抑」滲透進每個讀書人最私密的空間，無所不在。<sup>9</sup>

這場「全國範圍的思想文化普查活動」，<sup>10</sup>第一個影響是清代的讀書人畏於撰寫史書。康熙年間以降是經濟民生發展迅速的時代，理論上文事應當

<sup>7</sup> 關於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請參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sup>8</sup>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第四篇 清代禁書運動之高潮〉，頁 109；王彬，〈清代禁書概述〉，收入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北京：中國書店，1999），頁 13。

<sup>9</sup>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收入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修訂版），頁 395-502。

<sup>10</sup> 此為王鍾翰語，見王鍾翰，〈四庫禁燬書與清代思想文化普查運動〉，收入何齡修、朱憲、趙放編，《四庫禁燬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8。

盛行，然而史學卻異常衰落。<sup>11</sup>清代初期談遷（1594-1658）、張岱（1597-1679）均出版明史著作。但是在康熙二年（1663）「明史案」後文網漸密，計六奇（1622-1687）撰寫《明季北略》的序言時，甚且需要加上但書：「今上即位，亦論官民之家，有開載啟禎事蹟之書，俱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sup>12</sup>計六奇顯然明白書中不乏忌諱之語，而《明季北略》雖寫於康熙初年，卻直到清道光、咸豐年間方才出版。

與明代野史目不暇給的景況截然不同，清代除官方史書之外，幾乎沒有論及「當代史」的私人著述，取而代之的是考據性質的歷史研究，如錢大昕（1728-1804）的《廿二史考異》、趙翼（1727-1814）的《廿二史劄記》皆為「考史」之作，而非綜合性的述論。無怪乎章太炎（1869-1936）在清朝末年曾感嘆道：「雍正興詩獄，乾隆燬故籍。姍謗之禁，外寬其名，而內實文深。士益媮窳，莫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sup>13</sup>史書的匱乏，必須歸咎於清代的禁書政策。<sup>14</sup>

不僅是當代史，舉凡涉及遼東故實、元末明初、南明抗清的史事，尤其滿洲入關前的歷史，或以「夷狄」稱呼滿洲的歷史著作，全都溯及既往，一律抽燬或全燬。<sup>15</sup>少數幾種觸及南明三王的史書，如吳偉業（1609-1672）的《綏寇紀略》，完全從肯定清朝統治的立場書寫，紀年也全按清統；而夏燮（1800-1875）的《明通鑑》、徐鼎（1810-1862）的《小腆紀傳》則晚至道光、咸豐年間，文網漸疏之際方才問世。<sup>16</sup>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清朝入關前的史事，在清朝滅亡之前鮮有刊布，尚無人敢跨越此歷史禁區，當然這也與史料蒐羅不易有關。

清代禁書的第二個影響是民族、種族的意識淡薄。民國革命之成功，有

<sup>11</sup> 牟潤孫，〈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收入牟潤孫，《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76-683。

<sup>12</sup>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冊上（北京：中華書局，1984），〈自序〉，頁 1。

<sup>13</sup> 章太炎，《煇書》（重訂本），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冊 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329。

<sup>14</sup> 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漢學研究》，16：1（1998），頁 155-184。

<sup>15</sup>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第二篇 遭燬書籍內容之分析〉，頁 27-63。

<sup>16</sup>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第十二章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頁 605-645。

賴種族思想的宣傳，然而審視清代中葉以降讀書人的著作，以及他們閱讀某些書籍的感受，似乎從未意識到滿漢分離，或是引起漢族革命的火花。乾隆、嘉慶年間的揚州學派士人，例如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黃文暘（1736-？）等人的著作，反倒出現一種「倒錯的夷夏觀」。例如黃文暘的《通史發凡》稱趙匡胤（927-976）為「汴州盜」，趙構（1107-1187）則係「降將」，通篇以「夷狄」為正統論述史事。<sup>17</sup>錢大昕論及宋蒙交戰之事，竟說「其曲在宋，不在蒙古也」，為元朝開脫，可見一斑。<sup>18</sup>

清初大臣如魏裔介（1616-1686）係漢官顯貴，受清朝皇帝寵信，位極人臣，他當時尚能讚譽孫承宗（1563-1638）為諸葛武侯，並在文集中批判秦檜（1091-1155），讚揚李綱（1083-1140）、岳飛（1103-1142）等人。清中葉的趙翼則在討論明清戰事的文章中，處處尊稱「本朝兵」，南明抗清等事則未及一言，<sup>19</sup>讀書人在清初與乾隆年間的處境殆若天淵。1855年，李慈銘（1829-1894）讀到《揚州十日記》時僅僅表示「悚然增溝壑性命之感」，完全沒有預期中熱血沸騰、批判清廷的言語。<sup>20</sup>或許令人感到意外，清末革命黨人翹首盼望的漢族革命言論，並不見於清代中葉後的中國。

當代史的匱乏以及種族意識的淡薄，結果是幾個世代的集體遺忘。一位生於清代中葉的讀書人，捧讀清修《明史》、官方頒行的《御批通鑒輯覽》、坊間販售的《綱鑒易知錄》，肯定認為滿洲與明朝不曾發生過任何關係，畢竟此類書中隻字未提，他們甚至不知道滿洲究竟來自何方。讀書人也可能沒有今人理解的「滿漢關係」，錢穆（1895-1990）回憶幼時被一位老師錢伯圭（1883-1947）告知，清朝皇帝不是中國人，大為驚訝，返家詢問父親，才相信「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sup>21</sup>

<sup>17</sup>劉浦江，〈「倒錯」的夷夏觀——乾嘉時代思想史的另一種面相〉，收入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172-203。

<sup>18</sup>〔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卷8，〈宋季恥議和〉，頁151。

<sup>19</sup>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第四部第二章 清代學術における禁書の役割〉，頁497-532。

<sup>20</sup>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第十二章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頁613-614。

<sup>21</sup>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9），頁36。

1924年，博學如章太炎也必須入手幾種明代官書如《明實錄》，方知滿洲舊事。<sup>22</sup>儘管多方求索，動員幾位弟子四處蒐羅，現在看來成果有限。章氏在寫給弟子吳承仕(1884-1939)的書信中，坦承對於建州女真受朝命者何人、永樂三年(1415)毛憐衛受朝命者何人、努爾哈齊(1559-1626)受命為都督的敕書為何，全都茫然不知。<sup>23</sup>凡此因為清朝文化政策遺留下的問題，都將成為民國初年明清史家急需克服的難題。

## 二、後清朝的歷史學問題

清廷禁燬圖書，大興文字獄，配合一系列的官方出版品，建立了嚴整的歷史禁區。這個歷史性的長遠結構，深深地影響第一代的明清史家。他們是經歷過清末高唱排滿、宣傳種戰的世代，已然意識到「滿漢分離」，亦清楚知道清朝統治者曾進行意識形態控制。尤其故宮博物院陸續刊布收藏的檔案，加上此前諱莫如深、鮮為人知的禁書一一復出，<sup>24</sup>學者方才恍然大悟，過去研讀的書都是「修訂本」。<sup>25</sup>以研究明末清初史料聞名的謝國楨，時常發現清代流行的刻本並不完整，觸犯清朝忌諱的內容反見於私人抄本。<sup>26</sup>其次是史料不足，幾種今人熟知的文獻，例如刊刻於康熙年間，黃宗羲(1610-1695)編輯的《明文授讀》，謝國楨表示此書流傳甚罕。<sup>27</sup>

因為對於清代禁書缺乏整體的認識，而普遍得見的言論、證據均指向清朝統治者大肆改易古籍的作為，遂形成一股處處懷疑清朝文獻的風氣。<sup>28</sup>例

<sup>22</sup>章太炎，《書信集上·與吳承仕·三十二》，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冊12，頁424。

<sup>23</sup>章太炎，《書信集上·與吳承仕·三十七》，頁430-431。

<sup>24</sup>如中研院史語所的《明清史料》、北大與瀋陽東北圖書館的《內閣大庫史料》，相關研究見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第二章 明代史籍之編印與研究〉，頁25-47。

<sup>25</sup>例如著名的《明夷待訪錄》，相關研究參：吳光，〈《明夷待訪錄》與《留書》關係考〉，收入吳光，《古書考辨集》(臺北：允晨文化，1989)，頁141-150。

<sup>26</sup>此類例子甚夥，詳參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sup>27</sup>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69。

<sup>28</sup>這不僅是明清史學界的現象，必須考量到清末以降的疑古風潮，相關研究參考王



如當今史學研究頗為仰仗的《四庫全書》，朱希祖（1879-1944）批評道，清朝「實則揚彼（滿洲）抑我（漢人），真相難覩，一方且大興史獄，摧毀私史，陽以蒐羅《四庫全書》，陰實糾集明季史籍，大舉而銷毀之。」<sup>29</sup>孟森更不客氣，直言清廷纂修《四庫全書》，選擇抄本著錄而非原樣覆刻，本意正是燬禁刻本，「故《四庫全書》乃高宗愚天下之書，不得云學者求知識之書也。」<sup>30</sup>一律從陰謀論的角度評價清朝的文治業績，且認為這是一系列早有安排的行動。

清廷耗時九十五年纂修的《明史》乃正史之一，吳晗在寫給胡適（1891-1962）的信件中卻說：「近日在點讀《明史》，時時發現有極危險和可笑的錯誤。」<sup>31</sup>孟森則在課堂上不客氣地向學生表示此書「不能遂為信史」。孟森之所以對《明史》如此不滿，實源自清人諱飾入關前後的記述，他指出「《明史》所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清代與明本身之關係。」孟森認為清修《明史》，修史者若使用明代史料則可能牴觸清朝的歷史禁區，自然「必不能用明代真實史料」。<sup>32</sup>這種意見不是孟森的孤明先發，謝國楨同樣強調「以言夫《明史》，則於清初史事忌諱尤深，方域無建州之傳，清之先世語焉不詳。」<sup>33</sup>一部未能利用明代真實史料的史書，處處為清廷忌諱，當然不是值得參考甚至引用的文本。<sup>34</sup>

不僅是《四庫全書》、《明史》，現在被清史學者視為「原始史料」，廣泛徵引的《清實錄》一樣不可盡信。孟森便稱清朝官方「務使祖宗所為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淨盡，不留痕跡於《實錄》中，而改《實錄》一事，遂

---

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

<sup>29</sup>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畫〉，收入朱希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338。

<sup>30</sup>孟森，〈選刻《四庫全書》評議〉，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682-683。

<sup>31</sup>吳晗，〈致胡適（八）〉，收入吳晗，《吳晗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142。

<sup>32</sup>孟森，《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一編第一章 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頁4-5。

<sup>33</sup>謝國楨，〈明清史料研究〉，收入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109。

<sup>34</sup>對於《明史》的批評，另請參閱：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第二章 明代史籍之編印與研究〉，頁38-43。

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sup>35</sup>比喻清朝官方修改《實錄》，彷彿日常飲水吃飯一般正常。孟森自然相信《清實錄》「盡經改造」，<sup>36</sup>不復原本面目。他校讀清《高皇帝實錄》，發現乾隆年間修訂《實錄》時，掩飾了滿洲人曾向明朝稱臣的事實，「將建州衛為臣於明，掩蔽淨盡，其餘竄改甚多，不必遍舉，可以知其概矣。」<sup>37</sup>同時質疑供職實錄館的官員，無人敢冒厲禁，只好扶同諱飾。<sup>38</sup>整體而言，清朝遺留下的重要文獻莫不遭到懷疑，彷彿一文不值。

經過清代禁燬、文獻自我壓抑後的明清史料，固然在質性上存在問題，物理性的殘缺更提高研究的難度。畢竟明末清初動亂頻仍，文獻保存不易，留存的材料不足，增加明清史研究的難度。幸好自民國成立後「未毀之禁書競出」，<sup>39</sup>情況逐漸改觀。同時隨著禁書復出，學者益發明白清廷所為，尋找禁書並對其展開研究遂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話題。1938年8月30日，胡適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第八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發表論文名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sup>40</sup>文中提及六種「新材料」，其一便是「追尋原稿、禁書與遭忽視的書籍」。胡適表示（粗體劃線者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隨著滿清的覆滅，和本世紀以來的知識變遷，**學者更有意識地去尋找在清朝 300 年中因為政治和民族迫害而遺失的著作**，和那些因為不符合當時的知識主流而被長期忽視的書籍。<sup>41</sup>

胡適精確地總結民初學人的研究趨勢，且指出這個現象始於清朝滅亡之後，

<sup>35</sup>孟森，〈讀《清實錄》商榷〉，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冊下，頁 686。

<sup>36</sup>孟森，《清朝前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敘言〉，頁 2。

<sup>37</sup>孟森，〈《清史稿》中建州衛考辨〉，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冊上，頁 312。

<sup>38</sup>孟森，《清朝前紀》，〈敘言〉，頁 1-2。

<sup>39</sup>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一講 滿洲名稱考〉，頁 1。

<sup>40</sup>胡適，“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收入胡適，《胡適全集》，卷 3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 631-637。

<sup>41</sup>這段譯文參考下引譯作，標點與字詞有些微改動：胡適著，鄭群譯，〈新發現的有關中國歷史的材料〉，收入王育濟主編，《中國歷史評論》，輯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54。

中國的研究者開始蒐訪清代禁書。這場集體的行動源於兩點，一是對於存世文獻的不信任，尤其是清朝官方經手過的典籍；一是既然清代的史料不可盡信，他們試圖透過尋訪倖存的文獻，重建明朝、清朝的歷史。

1929年，朱希祖等人集合各校的專家，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目的之一便是重修清史。<sup>42</sup>他在討論南明史的編纂計畫時，表示「重修《明史》，固屬急要，南明之史更不容緩圖。」<sup>43</sup>說明重修《明史》、南明史皆是需要提上日程的急務。1930年，孟森論及「清史」作為一門學科的意義，認為理由是「清代官書之遠於事實。故易代之後，纂修清史，僅據官書為底本，絕不足以傳信而存真。此吾黨所以列『清史』為學科之意也。」<sup>44</sup>清朝遺留下的歷史學問題，以及種種困難，並不妨礙當時的明清史家重修正史的意志。

朱希祖、孟森等人重修、研究清史的動機，除前述結構性的遠因之外，近因則是對於《清史稿》的不滿。1914年，中華民國設立清史館，由趙爾巽（1844-1927）擔任館長。1927年，國內外情勢多變，加之經費日漸困難，趙爾巽決定逕自出版，因尚未完成，故名《清史稿》。<sup>45</sup>豈料《清史稿》甫問世，舉國譁然，溫和的批評者僅言「《清史稿》於南明三朝，亦語焉不詳。」<sup>46</sup>嚴厲抨擊者則俱陳《清史稿》「以清代官書為根據，不欲採及清室所禁之文辭」，<sup>47</sup>認為清史館的館員處處為清廷避諱。孟森曾嘲諷道：「《清史稿》撰述諸公，似多自認為前朝遺老，以先朝之欲惡為取捨，雖蹈曲筆而不辭。」<sup>48</sup>可見一斑。

圍繞著《清史稿》的議論，萌生出兩種意見，一是封禁《清史稿》並立刻著手重修《清史》，一是應在重修之際趁機編修「滿洲開國史」。1928年，

<sup>42</sup>朱希祖，〈發起中國史學會的動機和希望〉，收入朱希祖，《朱希祖文存》，頁334。

<sup>43</sup>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畫〉，收入朱希祖，《朱希祖文存》，頁338。

<sup>44</sup>孟森，《清朝前紀》，〈敘言〉，頁3。

<sup>45</sup>關於《清史稿》的纂修過程、史料來源、參與者名單，請參宋晞，〈清史稿纂修之經過〉，收入宋晞，《中國史學論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4），頁193-220。

關於《清史稿》的纂修問題，見何烈，〈六十年來之清史稿與清史〉，收入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史學》（臺北：正中書局，1974），頁453-515。

<sup>46</sup>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收入朱希祖，《朱希祖文存》，頁388。

<sup>47</sup>孟森，〈《清史稿》中建州衛考辨〉，頁298。

<sup>48</sup>孟森，〈清史傳目通檢序〉，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冊下，頁718。

時任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的葉公綽（1881-1968）表示，應該重修《清史稿》。他更提議，「滿清未入關以前，和明代有關係的時期，應編一滿洲開國史，為明清當時事實的聯鎖。」<sup>49</sup>行政院提交的報告也同意，應在本紀之前，補撰清開國前紀，「庶幾明清間，興廢往蹟，得以瞭然」。<sup>50</sup>政界、學界咸認為清朝入關前的歷史最為忌諱，《清史稿》卻諱莫如深，因此有必要撰寫滿洲開國史。至於這部為清朝歌功頌德的史書，暫時封禁，以待正式的《清史》問世。

既然學者意識到《清史稿》的問題，認為不能輕信，《四庫全書》、《明史》、《清實錄》等文獻則皆有被清人改纂的可能性，如何重修明史、清史自然是一大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清代史料的疑懼與不信任，導致得以入歷史學家法眼的史料少之又少。與今人的理解全然不同，當時的學者反而認為明清史的史料太少。葉公綽的意見是：

清代是異族入主中國，為防止漢人的不平，大興文字之獄，所以順康雍乾的學者，關於國家大事，都不敢私下紀載。即有述及，亦不過歌功頌德之詞。所以清代的史料，便感著異常缺乏的困難。雖然也有官吏的記載，但官吏是不盡可靠的。不靠官吏，又沒有私家著述可靠，這是很大的難處。<sup>51</sup>

透過這一條材料，清楚地呈現當時知識份子不信任清代史料的心態。文字獄、禁書政策的結構，致使一個世代的學人認為研治明清史無所倚靠。他們覺得官書肯定有立場，不可盡信，私人著述又畏於賈禍而避寫，官私兩空，史料匱乏。另一個例子是明清史家鄭天挺（1899-1981），1930年代他任教北京大學，在課堂上向學生提道：

清史特點，除明清史共同特點以外，清史本身尚有其特點。

1.清史尚未正式修，數年前所修之《清史稿》已封禁。無正史可資準繩。

<sup>49</sup>葉公綽，〈清史應如何纂修〉，收入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冊下（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頁536-544。

<sup>50</sup>〈行政院提：檢校《清史稿》報告案〉，收入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冊上，頁242-244。

<sup>51</sup>葉公綽，〈清史應如何纂修〉，頁538。

## 2. 清史史料所存者已甚微，國外之材料甚多，搜集為難。<sup>52</sup>

現在的學人肯定不認為清史史料甚少，反而感到文獻過多，無力徹底消化。<sup>53</sup>但從當時的背景理解，這是非常合理的判斷，凡此皆在後清朝歷史學的脈絡中。

值得注意的是，鄭天挺雖云清代史料不足徵，卻謂國外之材料甚多，只是搜集為難。此處的「國外之材料」指向 1930 年代的重要發現，即《朝鮮王朝實錄》。鄭天挺講授「近人研究清史之方法」時，羅列五種方法，其一是「有依據國外著作者，如孟心史先生據《朝鮮實錄》」，朝鮮正是研究清史的門徑之一，而代表性的學人則是孟森。<sup>54</sup>為什麼國外著作僅指《朝鮮王朝實錄》？這不是中國史家的創發，而必須歸諸日本史家的業績。在深入中國明清史家與日本史家的競爭之前，必須先梳理日本東洋史的發展，尤其關於朝鮮半島的歷史研究。如後所述，面對棘手狀況的中國史家「邂逅」了日本，然後「發現朝鮮」。

### 三、日本東洋史的朝鮮研究及其在中國的影響

關於日本東洋史的發軔與業績、研究者的系譜，乃至分門別類的學術史回顧，已累積相當可觀的成果。<sup>55</sup>在此無意重新梳理日本東洋史的發展歷程，或介紹日本學人的成就。唯一想指出的是，日本東洋史家很早開始研究朝鮮

<sup>52</sup>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冊上（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一編 緒論〉，頁 9。

<sup>53</sup>如莊吉發云：「有清一代，史料浩如煙海。」見莊吉發，《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出版說明〉，頁 2。顯然 1930 年代、1990 年代末討論明清史料的語境、認知有所不同。

<sup>54</sup>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冊上，〈第一編 緒論〉，頁 22。

<sup>55</sup>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岸本美緒編，《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3-54；窪寺紘一，《東洋学史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蔡長廷，〈日本對北亞史的研究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6）。入門性的學人介紹則可參考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 2 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

半島的歷史。明治中期的東洋史研究成果，不論在數量或品質上，均以朝鮮史的論文為先，堪稱日本東洋史研究始於朝鮮史研究。<sup>56</sup>加上 1910 年代以降，日韓合併，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大陸展開攻勢，促成更多研究者關心朝鮮議題，此一領域名家輩出。以下簡單地勾勒日本東洋史的朝鮮研究，進而檢視日本學者具備此種「朝鮮傳統」的研究成果，對中國學人造成哪些影響，尤其是他們如何認知日本研究的特色。

提及「東洋史」一詞，通常會追溯明治時期的那珂通世（1851-1908）。他在 1894 年提議將外國史分為東洋、西洋，是為東洋史的濫觴。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從事東洋史研究的學人，大部分關心中國史的議題，但東洋史的研究範圍，伊始的構想便是以中國為首，涵蓋朝鮮、印度等周邊國家，與刻板印象中囿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史」不同。1904 年，東京帝國大學聘請那珂通世的弟子白鳥庫吉（1865-1942）擔任史學科教授，搭配幣原坦（1870-1953）、池內宏（1878-1952）等人，組成陣容堅強的朝鮮史研究團隊。1906-1945 年間，東京帝大史學科的老師持續開設朝鮮史的相關課程，<sup>57</sup>這在當時的中文世界是難以想像的事情。<sup>58</sup>

東洋史另一重鎮京都帝國大學，1907 年聘請內藤湖南（1866-1934）擔任東洋史學講座講師，與後來加入的桑原隲藏（1871-1931）等人，被稱為「京都學派」。<sup>59</sup>中文世界對於內藤湖南、京都學派均不陌生，「唐宋變革論」歷

<sup>56</sup>「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研究は、まぎれもなく朝鮮史研究から始った。」見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史研究の伝統〉，收入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頁 235。同時日本很早出版朝鮮通史性的研究成果，如林泰輔（1854-1922）的《朝鮮史》（1892）、《朝鮮近世史》（1901）、《朝鮮通史》（1912）。

<sup>57</sup>課程清單請見井上直樹，《帝國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頁 34。

<sup>58</sup>當時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甚至沒有教授韓國歷史的老師。1922 年，北京大學請日本的朝鮮史家今西龍（1875-1932），費時一年講授朝鮮史，由今西龍日文授課，張鳳舉中文翻譯，重點內容摘錄於《北京大學日刊》，演講訊息始見《北京大學日刊》，1922 年 12 月 9 日，最後一次公告時間係 1923 年 6 月 15 日，共計十九次。

<sup>59</sup>必須說明的是，中文世界習慣並稱內藤、桑原等人，但宮崎市定的弟子礪波護清楚地表示，京都大學的東洋史傳統不始於內藤湖南。在他的理解中，京大文學部、京大人文研對於中國學、東洋史學的認知並不同，參見礪波護，〈東洋史学と世界史学〉，收入板垣雄三編，《世界史の構想》（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頁 33-49。

久彌新，迄今仍為學者熱烈討論。學界同樣重視的還有 1902-1912 年間，內藤湖南六次踏查滿洲故地，發現文溯閣《四庫全書》，以及滿、蒙、藏文史料，開啟研究非漢民族文獻的先河。<sup>60</sup>相形之下，內藤湖南作為一位清史研究者，他對朝鮮史料的重視，<sup>61</sup>以及這種觀念如何影響弟子稻葉岩吉(1876-1940)則相對遭到忽視。

當時日本學者非常注意新史料，也試圖挖掘新的文獻進行研究。他們眼中的競爭敵手是歐洲、北美的漢學家、史學家，而且總懷著一股屈辱與挫折的情緒，誓言必須有所作為。<sup>62</sup>1901-1903 年間，白鳥庫吉遊學歐美諸國，便感嘆日本的東洋研究非常落後，認為歐美學者在中國、蒙古、中亞等一系列研究領域儼然當世權威。不過白鳥庫吉注意到，國外學者尚無人著手研究滿洲、朝鮮，提議由日本人推進此項研究；<sup>63</sup>這除了展現白鳥庫吉的學術野心，同時與當時日本政府侵略滿鮮的國策有關。

1908 年，白鳥庫吉說服時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1857-1929），在滿鐵內部設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以下簡稱調查部），<sup>64</sup>旨在調查滿洲、朝鮮的歷史地理，並收集相關文獻。1914 年，滿鐵終止調查部，後續作業移交東京帝國大學。調查部執行任務期間，收羅為數可觀的中外文獻，內藤湖南在 1910 年一篇討論東洋史學現狀的文章中表示，去年（1909）以來日本蒐集的史料，最大宗的是朝鮮史料，而最大的蒐

<sup>60</sup>杉山清彥，〈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2008），頁 347-372；林志宏，〈內藤湖南與「滿洲」的文獻蒐集事業〉，《地域文化研究》，2（2017），頁 74-85。

<sup>61</sup>關於內藤湖南的清史研究，以及重視朝鮮史料，見傅佛果（Joshua A. Fogel）著，陶德民、何英鶯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第四章 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與清史研究〉，頁 135-190。

<sup>62</sup>白鳥庫吉，〈東西の東洋學者に就いて〉，收入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30-335。

<sup>63</sup>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の功績〉、〈滿鮮史研究の三十年〉，收入《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頁 384-390、403-407。

<sup>64</sup>井上直樹已注意到，調查部的名稱隨著時間改變，相關人士的回憶亦有所出入，本文採用的是最通行的稱呼，請讀者明鑑。參井上直樹，《帝國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頁 124-129。此外，關於滿鐵調查部的研究，請參：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

集者正是滿鐵。<sup>65</sup>事實確實如此，調查部很快於 1913 年推出兩卷《滿洲歷史地理》、兩卷並附圖《朝鮮歷史地理》，<sup>66</sup>並自 1915 年起，由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刊行十六冊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

內藤湖南認為此類數量驚人的史料，以及滿鐵實際展開的田野調查，大有助於日本的東洋史研究。倚靠此前掌握的文獻，以及滿鐵發現的資料，內藤得以將清入關前的史料分成三種：（1）清人自身留下的記錄、（2）成於明人之手者、（3）朝鮮人著作與傳來日本的史料。<sup>67</sup>他除了介紹幾種朝鮮史料的特色，同時意識到清朝編纂《實錄》多少有所忌諱，在這樣的情況下，朝鮮、明朝的資料得以相互查驗。<sup>68</sup>明乎此，1919-1922 年間，在內藤湖南的主持之下，滿蒙叢書刊行會出版古籍二十二種，包含朝鮮文獻《瀋陽日記》，實在情理之中。

在上述的發展脈絡中，中國明清史家的重要論敵稻葉岩吉，係承繼朝鮮傳統的日本東洋史家。<sup>69</sup>稻葉是內藤湖南的弟子，1898 年初遇內藤後，在他的指導下閱讀《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聖武記》諸書。1908-1914 年間，稻葉加入白鳥庫吉領導的調查部，他自承這段期間時常收到內藤湖南的來信，當時內藤正在講授清朝史，書簡來回往復，無慮數百通。儘管稻葉未曾明言，但合理地推斷，他應該也寄給恩師滿鐵最新的調查成果，內藤方得以很快掌握朝鮮史料的消息。<sup>70</sup>

稻葉岩吉任職調查部期間，完成兩本姊妹作《清朝全史》（1914）與《滿

<sup>65</sup>內藤湖南，〈東洋史學の現狀〉，收入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六卷）》（東京：筑摩書房，1972），頁 17-21。

<sup>66</sup>南滿州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查課編，《南滿州鐵道株式会社二十年略史》（大連：南滿州鐵道株式会社，1927），〈第九章 調查事業〉，頁 341-342。

<sup>67</sup>內藤湖南，〈清朝開國期の史料〉，收入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七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 321-344。

<sup>68</sup>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第二講 異族統一と外交・貿易〉，頁 53。《清朝史通論》雖出版於 1944 年，但收錄的文字乃內藤湖南兩次演講的內容，演講時間為 1915 年，詳見該書〈凡例〉。

<sup>69</sup>關於稻葉岩吉的滿鮮史觀與日本「滿鮮史」的關係，見桜沢亜伊，〈「滿鮮史觀」の再検討——「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と稻葉岩吉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会文化研究》，39（2007），頁 20-36。

<sup>70</sup>稻葉岩吉，〈予が滿鮮史研究過程〉，收入稻葉博士還曆記念會編，《稻葉博士還曆記念滿鮮史論叢》（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38），頁 1-28。



洲發達史》（1915），<sup>71</sup>後者由內藤湖南作序。根據稻葉自述，撰寫《清朝全史》始於1911年9月，1914年4月付印，隔年便出版《滿洲發達史》，速度驚人。<sup>72</sup>根據白鳥庫吉寫給後藤新平的信件，稻葉在調查部的工作，主要負責明末與清代，<sup>73</sup>他公私兩便，將工作所得與史料發現寫入兩部著作中。在這樣的脈絡下，稻葉的作品引用滿鐵購入的明清史料，以及訪查得來的朝鮮文獻如《瀋陽日記》、《西征錄》、《龍飛御天歌》，可以說十分合理。<sup>74</sup>畢竟調查部領導人白鳥庫吉召集諸人的目標，便是蒐集「韓國古文獻」，<sup>75</sup>而恩師內藤湖南同樣關心朝鮮史料。

揆諸日本東洋史的發展，稻葉岩吉可能不是人盡皆知的專家，但在中國明清史的語境中，他是日本史家的代表，震撼中國學界。1915年，僅僅一年，但燾（1881-1970）翻譯《清朝全史》全書，由中華書局出版。<sup>76</sup>但燾是清末的秀才，求學東瀛，就讀日本中央大學。他給予《清朝全史》極高的評價，認為此書大公無我，舉凡族類之競爭，朋黨之甚話，民治帝制之是非，忠邪順逆之畛域，皆如蚊蚋交鬪，皆能據事直書，發為公論。<sup>77</sup>顯然促使他譯畢全書的動力，是認同內容，無關日本的大陸政策，或中國大陸東北地區的動亂。

中國的知識分子、明清史家關注《清朝全史》，有意思的是，大多數人在讚賞之餘，頗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惱怒，而這更凸顯此書的地位。1922年，就讀東南大學的歷史系學生陳訓慈（1901-1991）表示，自稻葉《清朝全史》

<sup>71</sup>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4）。稻葉岩吉，《滿洲發達史》（東京：大阪屋號出版部，1915）。

<sup>72</sup>稻葉岩吉，〈予が滿鮮史研究過程〉，頁16。

<sup>73</sup>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第二章 滿鐵總裁〉，頁866。

<sup>74</sup>謹具三例為證，見稻葉岩吉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冊上（上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復刻上海科學院圖書館藏本，2006），頁26、68、105。而中國明清史家深知此一特色，詳後。

<sup>75</sup>稻葉岩吉，〈予が滿鮮史研究過程〉，頁12。

<sup>76</sup>漢譯《滿洲發達史》的速度較慢，從1930年開始，由楊成能翻譯，陸續發表於《東北叢刊》，第一次刊布為第四期（1930），止於第十六期（1935），翻譯至第七章。此刊物似乎流傳不廣，鮮為人知。《東北叢刊》現收入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冊76-78（北京：中華書局，2007）。楊成能翻譯的部分在1935年出版，見稻葉岩吉著，楊成能譯，《東北開發史》（北京：辛未編譯社，1935）。

<sup>77</sup>但燾，〈弁言〉，收入稻葉岩吉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冊上，頁2。

問世，國人從而譯之，八年間「學者取稽末由，則亦往往問津此書。夫以一國最近之事蹟，求之外史；奇恥大辱，寧下喪師割地？矧假手他人，抑揚由彼，推尋失真，又在所不免乎？」<sup>78</sup>按照陳訓慈的說法，《清朝全史》出版後八年，中國史家無甚著述，仍取材是書。陳氏不禁擔心，如此一來中國史的評斷全操於外人之手，這不僅是一大恥辱，更且放棄自身的詮釋權。

陳訓慈的憂慮不無道理，畢竟當時的意見領袖梁啟超（1873-1929）將《清朝全史》列入國學書目中，<sup>79</sup>而此時《清史稿》恰遭封禁，無一部清代正史可讀，《清朝全史》自然炙手可熱。另一方面，上列諸人尚非專攻明清史的學者，試看幾位明清史家的反應。金毓黻是著名的東北史家，<sup>80</sup>就讀北京大學期間師從黃侃（1886-1935），他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從 1930 年開始編纂《東北叢書》，即後來的《遼海叢書》。根據他的日記，第一次閱讀《清朝全史》是 1925 年 11 月 20 日，當下立即驚異於其間史料之豐富，云「幸有稻葉此書，擷采甚富，足資學者之研習，即修正史者，亦可取材於是。」將《清朝全史》視為纂修正史的資源，評價不低；金毓黻同時發出與陳訓慈一致的感嘆，揶揄中國「號稱衣冠文物之邦，學士林總，竟無一愜心貴當之清史，豈非事之至可耻者乎！」<sup>81</sup>

此後幾年，金毓黻的日記盡是折服於稻葉岩吉的讀書報告，例如他完全同意稻葉主張猛哥帖木兒（1370-1433）即清代文獻中的「肇祖孟特穆」，斡朵里即俄朵里，為女真之種名。關於清朝遠祖的傳說，也服膺稻葉利用朝鮮史料的論證，強調「當以此說解釋最為合理」。<sup>82</sup>論及滿洲人入關前的居所，亦云「清初祖實居斡木河非在敦化，稻葉氏辨正既詳，益以曹氏之說，而稻

<sup>78</sup>陳訓慈，〈清史感言〉，收入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冊下，頁 515。

<sup>79</sup>梁啟超、胡適，《梁任公胡適之先生審定研究國學書目》（上海：亞洲書局，1923），頁 16。

<sup>80</sup>關於金毓黻的治學成績，以及與學人的交往，請參見霍明琨，《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毛利英介，〈滿洲史と東北史のあいだ：稻葉岩吉と金毓黻の交流より〉，《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8（2015），頁 343-363。

<sup>81</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2（瀋陽：遼瀋書社，1993），卷 34，頁 1431-1432。

<sup>82</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3，卷 38，頁 1612。

葉氏之說尤為顛撲不破，此可作為定案矣。」<sup>83</sup>這些現在看來完全已被網路檢索取代的歷史知識，在當時是備受矚目的學術突破，而這盡出外國學者之手。

金毓黻意識到，稻葉的《清朝全史》、《滿洲發達史》的突出貢獻，係基於「吾國人向未寓目者不啻數十種之多」的文獻，例如流傳日本的《清三朝實錄》、<sup>84</sup>明代文獻《全遼志》，以及「朝鮮人所著之古史之冊檔」。即便是中國得見的史料，稻葉因為能夠利用度藏朝鮮國內的明清史料，條件仍勝過中國學人，而這也促使金毓黻回過頭重新檢查中國史料：

稻葉氏謂，今通行本《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皆於清代經一度之刊削，已非本來面目。乾隆三十八年頒禁書令，前人著述中有敘滿洲故事者皆抽毀之，二書之受刊削也以此。朝鮮奎章閣存書有《讀史方輿紀要》，為未經抽毀之本，可以參證。愚(金毓黻)按：今廣州刊本之《讀史方輿紀要》所繪遼東地方圖刊落甚多，四至中應載建州，乃竟無之，其照刊原本刊落之跡猶可考見，稻葉氏之語固自不誣。<sup>85</sup>

稻葉岩吉這些「皆足令人驚異」的史料發現，令金毓黻感到慚愧，承認「吾國通博之士匪少，以言清史，乃不如稻葉創獲之多。」<sup>86</sup>日本史家的成果令中國學者折服。閱一年，他又重讀《清朝全史》，自稱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因為「此書取材宏富，不宜滑口讀過也。」<sup>87</sup>且指出儘管感到可恥，但該書語皆有據，未來纂修清史不能不取材於此。<sup>88</sup>

今人目為開創清史研究的宗師蕭一山(1902-1978)，同樣震懾於《清朝全史》。他撰寫《清代通史》的原因，正源於稻葉岩吉《清朝全史》譯本的流行，

<sup>83</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3，卷38，頁1613。

<sup>84</sup>即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三朝實錄的日本抄本，關於其版本源流與史料價值，見神田信夫，《清朝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日本に伝存する「清三朝實錄」の來歴について〉，頁403-417。稻葉岩吉很推崇《清三朝實錄》，並質疑《清實錄》「果有若何之程度可以徵信乎？」見稻葉岩吉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冊上，頁62。

<sup>85</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3，卷45，頁1913。

<sup>86</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3，卷41，頁1778。

<sup>87</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3，卷44，頁1881。

<sup>88</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3，卷44，頁1869。

為洗雪這份恥辱，遂發憤撰寫有清一代之通史。<sup>89</sup>諷刺的是，金毓黻閱讀蕭一山《清代通史》的感想，居然稱是書「全取日人稻葉氏之說，別無發明」。<sup>90</sup>無怪乎金毓黻繼漢譯《清朝全史》後，擬翻譯姊妹作《滿洲發達史》。必須指出的是，金毓黻珍視的不是稻葉的史觀，而是其中「可取之資料甚多，正可取為漁獵之資」。<sup>91</sup>與此同時，另一位重量級的明清史家謝國楨也表達近似的觀點。

謝國楨在 1930 年出版的《清開國史料考》中表示，《清朝全史》是研究有清一代最早且最有系統之書，他同金毓黻一樣，指出蕭一山《清代通史》「多取材於日人稻葉岩吉」，也發現稻葉岩吉的一大特色是根據朝鮮史料如《燃藜室記述》、《瀋陽日記》，使得稻葉的立論卓見頻發。<sup>92</sup>更重要的是，1926 年謝國楨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其間曾到江浙、大連、瀋陽，東渡日本訪求遺書，寫成《晚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考》。<sup>93</sup>從他的著作可知，他已意識到日本的朝鮮史研究業績，且明白這是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等人主持學林的一系列成果。<sup>94</sup>他還注意到朝鮮史料的價值，將這些發現與心得寫入書中。

如前所述，明清史家不信任清代遺留的文獻，特別是清入關前的記述，基本上持極負面的態度。然而朝鮮史料全無此等問題，畢竟這是寫於朝鮮人之手，存寄東國的域外文獻。清初史事存於《清實錄》者，記事明確，惟「可為旁證之史籍甚少」，朝鮮史料的價值自然不僅止於清朝、朝鮮關係史，「而在清初史料更加重要」。<sup>95</sup>謝國楨訪書大連、日本期間，知曉白鳥庫吉、稻

<sup>89</sup>「民國八九年間，日人稻葉岩吉之《清朝全史》譯本方流行，而觀點純謬，疏舛頗多，私念為吾國士林之恥，遂發憤撰清代通史。」見蕭一山，《清史》（臺北：華岡出版公司，1980），〈後記〉，頁 199。

<sup>90</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3，卷 49，頁 2094。

<sup>91</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卷 55，頁 2391。

<sup>92</sup>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卷 5，頁 308-309。

<sup>93</sup>謝國楨，《謝國楨全集》，冊 1（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自述〉，頁 2。

<sup>94</sup>謝國楨還曾為撰寫《晚明史籍考》，透過書信向內藤湖南討教，如「安陽謝國楨剛主為考晚明史料曾從先生問業。」見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卷 74，頁 3165。他們通信的時間最早可追溯 1930 年，見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55。

<sup>95</sup>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卷 6，頁 315。

葉岩吉等人的研究，認為他們刊布的幾種報告書，雖然「作於十餘年以前，而吾國近年關於東北歷史之著作，尚難有與之倫比者」。值得一提的是，謝國楨在大連邂逅甫出版的《朝鮮王朝實錄》，當時稱為《李朝實錄》。<sup>96</sup>京城帝國大學從1929年開始籌備，1930-1932年陸續刊印，因為卷帙浩繁，僅印成三十部。<sup>97</sup>可惜謝國楨並未久待，但至少為中國學者留下一條重要線索。

對於無緣踏訪東北、渡海東瀛的中國史家而言，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是唯一泛述清史的作品。稻葉繼承內藤湖南的主張，研究東北須從朝鮮檔案下手。1932年，金毓黻當面與稻葉論學，期間稻葉亦云，乃師內藤常言研究遼東史實，宜先從朝鮮入手，不少在中國不能得者，在朝鮮則往往得之。<sup>98</sup>閱一年（1933），金毓黻向內藤湖南請教，內藤同樣表示「朝鮮史中尤多滿洲史料，欲徹底研究滿洲史，非先從高麗史入手不可。」<sup>99</sup>在在證明日本東洋史家有意識地利用朝鮮史料，因此林同濟（1906-1980）盡讀稻葉岩吉《滿洲發達史》後，指出內藤主張研究東北須由朝鮮檔案下手，而稻葉正是此一取徑的繼承人，可以說其來有自。<sup>100</sup>

現在我們能重新審視明清史宗師孟森，他生於同治七年（1868），1930年代已逾花甲之期，這卻是其學術產量最高的歲月。孟森自《心史叢刊》以降一系列著作，顯然格外關注清朝前史，從他的自述可知，這個興趣起於1910年代，也就是清朝滅亡之後。<sup>101</sup>孟森不是堅定排滿的革命黨人，恰好相反，他希冀自己的研究能夠釐清革命以後好事者妄造的清代故事。他指責這種無數荒誕不經的汗鱗之談「以圖快種族之私，而冀聳流俗好奇之聽。」<sup>102</sup>因此他在著述上萬般謹慎，不敢循革命潮流汗鱗清朝，甚且將此立場寫於書前，<sup>103</sup>可見更希望時人注意其學術上的關懷。

<sup>96</sup>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卷6，頁313-314。

<sup>97</sup>謝剛主（國楨），〈朝鮮李朝實錄纂修述略〉，《中德學誌》，5：4（1943），頁634。

<sup>98</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4，卷67，頁2839。

<sup>99</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4，卷74，頁3170-3171。必須說明的是，中國、日本學者時常用「高麗」稱呼「朝鮮」，此處的高麗應理解為「朝鮮」。

<sup>100</sup>林同濟，〈書評《滿洲發達史》〉，《政治經濟學報》，4：3（1936），頁659-664。

<sup>101</sup>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冊1（北京：中華書局，2006），〈自序〉，頁1。

<sup>102</sup>孟森，《清朝前紀》，〈敘言〉，頁3。

<sup>103</sup>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冊1，〈自序〉，頁1。

問題是孟森不信任《四庫全書》、《清實錄》，特別是涉及清朝入關前的史事，疑懼非常，這也導致他難以展開研究。在這樣的脈絡下，與金毓黻一樣，孟森注意到稻葉岩吉《清朝全史》中摘錄的史料，這成為他的重要論據。1929-1930 年間，他執教南京的中央大學歷史系，主講清史，後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課講義，即《清朝前紀》（1930）。孟森在書中提及研究上的困難，以及日本學者扮演的關鍵角色：

日本人搜羅清朝故事，究以同文之故，援據確鑿，與歐洲人不同。有稻葉岩吉等，為考求清事之專家。先出《蒙古滿州地理歷史》一書，其中關於清之先世各篇，所引多明之《實錄》及明代所成之《全遼志》等書，種類亦無幾，然皆為吾所未見。又有朝鮮人著述數種，更非吾國人所流行。繼又出《清朝全史》一書，所述事實，略較《地理歷史》為多，而頗有不標明出處者，亦為一憾。但據其著書之例及所徵引之可信，則知敘述亦斷然有本。反而求之吾國故籍，為明季士大夫所著者，再從清代官修之《明史》推勘之，其所掩滅者固多。<sup>104</sup>

孟森的這番話，清楚地揭示當時研究明清史的難處，並點出日本學者何以重要，尤其是他們發現的史料，適足以消解中國史家不信任清代文獻的焦慮。孟森既然如此關心滿洲開國史，自然不會放過謝國楨的《清開國史料考》。他 1930 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學的講義曾提及此書，肯定參閱過，多少掌握日本的研究情形。<sup>105</sup>日本學者的發現如此重要卻無得獲見，唯一的出路便是直接徵引《清朝全史》，陳訓慈的擔憂、金毓黻的倡議由此成真。

翻開《清朝前紀》、《滿洲開國史》，孟森不時提及稻葉岩吉與《清朝全史》，僅《清朝前紀》便超過一百次，這是學術著作罕見的現象。此類例子繁多，茲不憚繁冗，徵引三段文字為證：

《明實錄》但言阿哈出為野人頭目。稻葉引《龍飛御天歌》，則載其與猛哥帖木兒，各為女真三萬戶之一。所謂移蘭豆漫者，說見《女真紀》。夫「龍飛御天」者，朝鮮李氏自頌其開國之詞也。朝鮮國在明以前，久稱高麗。其國主王姓，傳世已數百年。洪武二十四年，高麗

<sup>104</sup> 孟森，《清朝前紀》，〈第二篇 清朝前紀之綱領〉，頁 6。

<sup>105</sup> 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第三講 建州〉，頁 49。

大將李成桂廢其主瑤自立，復朝鮮之舊名，在位九年，至建文二年，傳子芳遠。《龍飛御天歌》，皆指成桂得國時事。其時佩劍入衛之三萬戶中，猛哥帖木兒與阿哈出皆在列。<sup>106</sup>

孟哥入居朝鮮孔州，即鏡城之阿木河地。據稻葉引朝鮮人所撰《燃藜室記述》卷七，中一則曰：「太宗十年，女真入寇孔州，韓興富戰死，郭承佑亦敗。仍以在其地之兩陵，遷於咸州，以民戶並於鏡城，遂空其地。當時臣僚，或謂孔州當四散之地，防守極難，不若革罷之為愈。或謂境內數百里之地，豈可棄與夷狄，敵必相率而入處矣。太宗曰：『國家疆域之內，固不可令夷狄居。然若因而黜之，則有何不可？』遂從革罷孔州之議。其後風聞大明於孔州之地建衛，朝議大駭。太宗十七年丁酉，即升富居為慶源，割鏡城之豆龍耳以北之地為都護府，設柵屯兵以守之。」云云。<sup>107</sup>

稻葉氏《清朝全史》第六節，紀馬市事，較《明史》為詳。《會典》等書，今亦尚存。惟馬市事非本篇所必載。本篇但欲詳董山所求開之撫順關，則據稻葉所引，一《全遼志》：「撫順馬市，在城東三十里。建州諸夷人，於此交易買賣。」二引《廣輿記》：「馬市一設開原城南，一設開原城東，一設撫順，一設廣寧，一設古城堡。」三引《方輿紀要》，記撫順關云：「撫順所之東二十里，置馬市於此。」撫順馬市，明紀載所習見，而《〔明〕史》竟沒之。<sup>108</sup>

這三段文字除了說明孟森的研究仰仗稻葉發現的史料，同時具備三種意義。其一，孟森意識到《明實錄》的缺漏，論證過程需要朝鮮史料檢查中國文獻的真偽，而他傾向相信朝鮮人著作。其二，孟森會大段大段抄錄稻葉《清朝全史》的引文，這顯示出當時研究者史料不足徵的困境。其三，即便是中國史料，日本學者仍佔勝場，寓目孟森無法得見的史料。當代的史學研究鮮有引據二手著作為史料者，而一流史家如孟森的處處受限，足見中日雙方處於截然不同的研究環境。

<sup>106</sup> 孟森，《清朝前紀》，〈第四篇 建州紀第二〉，頁33。

<sup>107</sup> 孟森，《清朝前紀》，〈第六篇 肇祖紀第四〉，頁73。

<sup>108</sup> 孟森，《清朝前紀》，〈第七篇 褚宴充善紀（童昌董山）第五〉，頁86。

日本東洋史的發展，與中國明清史家的困難交匯於此。一個鑲嵌於東洋史結構中的「朝鮮史研究」，挾著對清史的關心，以及劍指滿洲、朝鮮、蒙古的企圖，日本史家肆力搜羅、利用朝鮮文獻，自成脈絡。而成長於清末的中國第一代明清史家必須面對的課題是，如何在史料不足徵、不信任清朝史料，且《清史稿》不盡如人意且未公開的景況下展開研究。內外合力的結果，中國史家注意到日本史家的「朝鮮發現」，並藉此展開他們的研究，這是朝鮮進入明清史家視界的第一幕。中國史家很快地掌握更多「武器」，嘗試在史學的競技中回應稻葉岩吉等人，而他們的首要目標便是謝國楨在大連圖書館翻閱的《朝鮮王朝實錄》。

#### 四、中國的明清史研究與《朝鮮王朝實錄》

1928年，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將國立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並遷址中南海的居仁堂。第一、二任館長馬敘倫（1884-1970）、蔡元培（1867-1940）的任期都不長，倒是副館長袁同禮（1895-1965）從1929年服務迄1940年，期間曾任代理館長，後扶正，任職最久。袁同禮畢業於北京大學、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歸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講授版本目錄學，在前往北平圖書館之前已有豐富的經驗。1932年，北平圖書館在袁同禮的主持下，購入中國第一也是唯一一套《朝鮮王朝實錄》。

因為缺乏直接證據，無法具體討論袁同禮對於朝鮮文獻的看法，唯一可知的是日本起初不願意出讓，是幾經交涉方才成事。<sup>109</sup>願意費力入手外國史料，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時重要的研究單位頗關心朝鮮史料。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便很積極搜羅朝鮮總督府的出版品，例如《朝鮮古蹟圖譜》以及日本的歷史學者、人類學家在朝鮮的發掘報告。<sup>110</sup>

不論如何，北平圖書館購入《朝鮮王朝實錄》的同年，兩位中國學人很

<sup>109</sup>「當時京城帝國大學日本負責人初不願此書流入中土，經我國立北平圖書館再三交涉，始於民國二十一年獲得一部載回北平，供國人探討研究。」見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編，《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頁153。

<sup>110</sup>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元360-12、元360-15。



快注意到此書，並馬上著手摘抄全書。其一是孟森，他在 1931 年獲聘北京大學教席，因緣際會，他是《朝鮮王朝實錄》最早的讀者之一。孟森在課堂上向學生表示：得此實錄，「治明清史學者又獲一新寶庫，亦其個人生平大快事」，因此三年間無分寒暑，逐卷批覽，笥記滿桌。<sup>111</sup>

其二則是吳晗，他自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他與孟森一老一少，步行走過文津街，進入北平圖書館抄書。<sup>112</sup>1934 年，吳晗利用抄錄朝鮮實錄的成果，撰寫一篇關於女真首領李滿柱（1390-1467）的專題論文，透過他的一段話，可以理解吳晗、孟森關心的問題是一致的：

過去研究建州史的學者所能得到的史料只是幾部禁燬倖免的明人著作和朝鮮方面的記載，其中最主要的是《明實錄》。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一部影印本《朝鮮李朝實錄》，記建州初期史實極詳盡，從此我們可以拿中國、朝鮮兩方實錄來勘會証，重新來寫明清史中關於建州的一部份的記載了。<sup>113</sup>

根據胡適回覆吳晗的信件，吳晗至遲在 1931 年 9 月，已對滿洲入關前史頗感興趣。胡適提醒道，「滿洲未入關以前的歷史，有人專門研究，可先看孟森《清開國史》一類的書。你此時暫時不必關心。」<sup>114</sup>看來吳晗並未聽從胡適的建議，他在隔年便將心力投注在抄錄《朝鮮王朝實錄》上，完成著名的十二冊《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sup>115</sup>這同時說明，吳晗在 1930 年寫完《胡應麟年譜》後開始抄錄朝鮮實錄，並不是甚麼令人意外的學術興趣轉向。<sup>116</sup>

約莫在同一時間，中國、日本學人開始抄錄《朝鮮王朝實錄》。中國方

<sup>111</sup>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編，《中韓文化論集（一）》，頁 157。

<sup>112</sup>鄭天挺，〈有學力、有能力、有魄力的歷史學家——追念吳晗同志〉，收入鄭天挺，《探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453-456。習之編，《吳晗年譜：著述篇》，冊上（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7），頁 48。

<sup>113</sup>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之李滿柱〉，收入吳晗，《吳晗全集（第三卷）》，頁 37。本文在《燕京學報》原題為〈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

<sup>114</sup>吳晗，〈附錄：胡適致吳晗（1931 年 9 月 12 日）〉，收入吳晗，《吳晗全集（第十卷）》，頁 140-141。

<sup>115</sup>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sup>116</sup>不僅如此，吳晗還據《朝鮮王朝實錄》寫就幾篇文章，如〈明代的殉葬制度〉、〈「高麗女」考〉，均收入《吳晗全集》。

面始於 1932 年的孟森、吳晗，日本方面則是 1933 年池內宏、旗田巍等人在外務省的經費挹注下的成果，即今人所見的《明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sup>117</sup>現在鮮為人知的是孟森的成果。雖然該書已經佚失，但金毓黻在 1948 年確實親眼見到孟森的夫人拿出三十七冊的《朝鮮實錄鈔》，每冊書眉標明代年月，以與朝鮮紀年對照，附有簡單按語。<sup>118</sup>幸運的是，根據中華書局最近出版的《孟森遺稿彙刊》，<sup>119</sup>內中收錄孟森的《朝鮮實錄檢查日曆》可知，孟森著實徹底地翻閱過《朝鮮王朝實錄》，而從檢查日曆中頻繁出現的註記如李滿柱、董山、童倉等人名，顯見這是他研究滿洲入關前史的索引。

孟森於 1931 年北上京師，這已是其生涯的暮年，卻是他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七年之間成書百萬言，遠邁舊日之作。<sup>120</sup>從《孟森遺稿彙刊》收錄的《明代足證建州文字》可知，不僅是那些在 1930 年《清朝前紀》提及「吾所未見」的古籍，更多明清史料都盡收囊中。他大量摘錄《明會典》、《明實錄》、《全遼志》、王瓊(1459-1532)《王晉溪本兵敷奏》、姚希孟(1579-1636)《姚宮詹文集》諸書，藉此研究清朝前史。<sup>121</sup>孟森透過互讀明清史料、朝鮮實錄，收穫豐富，且給予朝鮮史料很高的評價，如稱「夫《朝鮮實錄》所載，自最可信。」<sup>122</sup>或云「讀朝鮮《李氏朝實錄》，確證甚多，為之大快。」<sup>123</sup>在採摭中外史料的基礎上，孟森寫就代表性的著作《明元清系通紀》。

孟森撰寫《明元清系通紀》與他閱讀《朝鮮王朝實錄》乃同時之事，而此書則為他取得殊榮，被當時的學人譽為其最高成就。孟森撰寫此書的旨趣是還原清朝先世，具體的方法是「以《明實錄》、《朝鮮實錄》兩官書為取材之地」，他希冀這項結果能「為國家修《清史》及補修《明史》之用」。<sup>124</sup>1932

<sup>117</sup>《李朝實錄抄錄事業助成 池內宏 自昭和八年至昭和十三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編號：H-6-2-0-3\_009。

<sup>118</sup>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9，卷 146，頁 6623。

<sup>119</sup>孟森，《孟森遺稿彙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

<sup>120</sup>這是孟森弟子吳相湘的斷語，見吳相湘，〈明清史權威孟心史〉，收入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冊 1（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頁 237-242。

<sup>121</sup>孟森，〈明代足證建州文字〉，收入《孟森遺稿彙刊》，冊 7，頁 3801-4030。

<sup>122</sup>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第五講 肇祖原皇帝補紀〉，頁 128。

<sup>123</sup>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前篇第四 建州衛地址變遷考〉，頁 61。

<sup>124</sup>教育部編，《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研究專題概覽》，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頁 332。

年的孟森不再需要倚靠稻葉岩吉的《清朝全史》，他能直接參考《朝鮮王朝實錄》。<sup>125</sup>《明元清系通紀》獲得極大的成功，顧頡剛(1893-1980)回顧 1845-1945 年間的史學研究時，指出百年間的清史研究當以孟森、蕭一山的貢獻為最大：

其(孟森)成就最大的，則是《明元清系統紀》。……清人肇基於明初，本為明朝的屬夷，至太祖努爾哈赤猶身自朝明廷三次。清代對此種史實均極力為之隱晦。孟氏蒐集群籍，更旁及外國史料，做為長編，以補明清兩史的闕漏，兼發清人隱晦的痕跡。<sup>126</sup>

此處的「外國史料」指的正是《朝鮮王朝實錄》。《明元清系通紀》大量摘錄朝鮮實錄，份量多達全書篇幅的七八成。<sup>127</sup>在後清朝歷史學的背景，這是驚人的發現，是世所公認的業績。胡適閱讀《明元清系通紀》，直言「此書材料以《朝鮮實錄》為主，與《明實錄》相印證，考得滿洲先世史乃與明朝一代同時。其中有許多極有趣味又極重要的史實。」<sup>128</sup>孟森的弟子吳相湘(1912-2007)同樣稱業師「埋頭研究明清之際歷史的成就，特別是發現滿清皇室著意隱晦的他們祖先的許多史實，使他獲致這一學術領域中最高權威的榮譽。」<sup>129</sup>日本學者今西春秋(1907-1979)同持此見，<sup>130</sup>孟森的「朝鮮發現」是他獲致此項殊榮的主因。<sup>131</sup>

1930 年代以前的學人研治清初史事，皆以史料難得為憾。謝國楨云：「自

<sup>125</sup>所以孟森在《清朝前紀》、《滿洲開國史講義》尚轉引稻葉岩吉《清朝全史》的史料，然而在《明元清系通紀》卻開始對話、挑戰稻葉岩吉的論點，這種轉變的背後即是孟森開始大量閱讀《朝鮮王朝實錄》的結果。

<sup>126</sup>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7)，〈下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後期〉，頁 95。

<sup>127</sup>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頁 157。當時在北平圖書館服務的謝國楨也表示：「孟心史先生研治明史，撰《元明清系通紀》，即取材是書。」見謝剛主(國楨)，〈朝鮮李朝實錄纂修述略〉，頁 634。

<sup>128</sup>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冊 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934 年 2 月 27 日，頁 336。

<sup>129</sup>吳相湘，〈我的業師：孟心史先生〉，收入何齡修編，《孟心史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 26。

<sup>130</sup>今西春秋，〈孟森氏の訃〉，《東洋史研究》，4：2(1938)，頁 158-160。

<sup>131</sup>不僅如此，孟森還利用《朝鮮王朝實錄》的發現，撰寫幾篇論文，如〈清高宗內禪事證聞〉，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冊下，頁 562-578。

有朝鮮史料發現以來，昔日最難明之問題乃得解決。」<sup>132</sup>而最完美了結此案者，正是孟森。他在日本學者的啟發下，注意到朝鮮史料的價值，進而利用此域外文獻，解決中國史家的問題。後清朝的歷史學問題與朝鮮史料的結合，締造當時清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將「朝鮮」帶入中國的明清史學界。此後朱希祖〈後金國汗姓氏考〉、<sup>133</sup>鄭天挺〈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sup>134</sup>均引用《朝鮮王朝實錄》與稻葉岩吉的研究對話，凡此皆可追溯自金毓黻、謝國楨、孟森等人的系譜。

## 五、餘音與先聲：1930年代以後的發展

最後，本文擬簡要梳理 1930 年代以降的發展，檢視前述「猜疑清代史料的心態」何時消失，以及第一代明清史家運用朝鮮史料的興趣，如何轉為「中朝關係史」。經過前後學術史的比較，將有助於呈現「朝鮮史料」在孟森、謝國楨等人眼中的特色，及其可能產生的問題。這同時亦可解釋，何以至今許多中朝關係史的研究者本是明清史家。按照中國明清史研究的內在理路，「朝鮮」伊始便鑲嵌其中。

七七事變（1937）之後，中日兩國從局部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北平圖書館為免珍本受累，書籍陸續南運。<sup>135</sup>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向北平圖書館借用《朝鮮王朝實錄》，因此抗戰期間這套書由史語所保管。<sup>136</sup>時任所長的傅斯年擔心日軍空襲，波及文物、古籍、研究資料，派人在大後方四處

<sup>132</sup>謝國楨，〈明清史料研究〉，收入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 109-135。

<sup>133</sup>朱希祖，〈後金國汗姓氏考〉，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冊上（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頁 19-64。

<sup>134</sup>鄭天挺，〈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收入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31。

<sup>135</sup>「事變發生，書籍南運。」見謝剛主（國楨），〈朝鮮李朝實錄纂修述略〉，頁 634。

<sup>136</sup>張存武，〈民國以來的中韓關係史研究〉，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冊中（臺北：臺大出版組，1992），頁 918。

求訪，設法找一個在地圖上不見名字的地方，最終落腳四川南溪縣的李莊。<sup>137</sup>中國唯一一套《朝鮮王朝實錄》便隨著史語所運往李莊，期間引起幾位研究員注意，用力最深者為李光濤、王崇武。

李光濤小孟森二十九歲，晚了一個世代，但他關注的題目、運用資料的方法、對於朝鮮史料的理解與孟森幾乎一致。李光濤明白朝鮮實錄之難得，稱「日本影印無多，以此外面流傳不廣」，事實上史語所以外的學人根本無從見到。他從 1942 年開始抄錄《朝鮮王朝實錄》，費時三四年之久，與孟森所耗的時間相當。他十分推崇朝鮮實錄，認為「比之《明實錄》、《清實錄》等刪削性的著錄是大大不同的」，顯示他對明清實錄有所保留。<sup>138</sup>李光濤的研究領域與孟森多所重疊，如〈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清入關前之真象〉、〈清人入關前求款之始末〉諸文，可知特別關心清朝入關前史。

從謝國楨、孟森的脈絡往下讀，李光濤主張「閱明清檔案，須再閱朝鮮實錄」，指的並不是利用朝鮮實錄補充明清史料，而是借此檢證、考驗明清史料的真假。因此他強調，《清實錄》內關於天女朱果的傳說、清太宗奪位等史事，「都是些清人開國的大事，這些大事，都是全賴朝鮮的史籍才能證明的。」且覺得明朝的讀書人其實了解不多，而「朝鮮知建州底細有過於明人」。他知道此番斷語可能招致非議，但仍表示：「試專就朝鮮實錄內記事論之，總是千真萬確不外為一有力之質證而無可訾議的。」<sup>139</sup>堅定不移地讚譽朝鮮實錄的價值。

尋繹此前明清史家的系譜，李光濤對朝鮮實錄的評語可謂一脈相承，一些乍聽之下顯然溢美的讚詞也就不令人意外，例如他曾表示：「朝鮮的文獻不但《實錄》是一寶，就是其他一般的史籍同樣具有重要性，可以說同是天地第一善本。」<sup>140</sup>此後李光濤不僅專注明末清初研究，更利用摘錄李朝實錄

<sup>137</sup>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臺大歷史學報》，20（1996），頁 10。

<sup>138</sup>李光濤，《中韓民族與文化》（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序〉，頁 1。

<sup>139</sup>這一段的引文均出自李光濤，〈記李氏朝鮮實錄〉，收入董作賓等編，《中韓文化論集（一）》，頁 143。

<sup>140</sup>李光濤，〈記《朝鮮實錄》中之大報壇〉，收入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832。

的史料，寫就專著《萬曆二十三年封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考》（1967）、《朝鮮「王辰倭禍」研究》（1972），以及史料彙編五卷本《朝鮮「王辰倭禍」史料》（1970）。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李光濤或許受到民國初年排滿宣傳的影響，立場極度仇視清朝，只稍參閱〈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中指責清朝官方「欺人」，說這段史實係「醜史」，輕蔑之情躍然紙上。這種嫌惡的心理與猜疑清代史料的學術意見互為表裡，也促使他更相信域外文獻。

在李莊注意到《朝鮮王朝實錄》的第二位學人是王崇武。他生於民國元年（1911），比孟森、李光濤都小。王崇武 1936 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入史語所工作，專門研究明史。其名著《明靖難史事考證稿》，<sup>141</sup>初看題名不免覺得與朝鮮無甚關係，然而明初靖難，建文帝（1377-？）曾聯絡朝鮮為犄角之勢，並向其商購戰馬；朝鮮方面為研擬中國策略，也積極地收集情報，朝鮮實錄遂為明史研究之珍寶。《明靖難史事考證稿》第六章〈惠帝與朝鮮〉，便整理相關史實，開相關研究之先河。其次，明朝初期與朝鮮交往仰賴宦官，以王崇武的成果為基礎，朴元燾、陳學霖（1938-2011）才得以繼續深入發微。<sup>142</sup>

儘管王崇武不專門研究清史，從他的著作推論，可能不太信任《明史》，曾指出其中「緣情增飾之處又勢所難免」。<sup>143</sup>綜而言之，李光濤、王崇武對清朝史料的理解、研究的徑路，都可視為 1930 年代的延續。再者，或許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他們開始嘗試利用《朝鮮王朝實錄》研究一些明清史之外，涉及中外關係史的議題，如 1592-1598 年的王辰倭亂。<sup>144</sup>目前視為「文化交流史」的議題，伊始出自明清史家之手，與冥冥中的書緣、國際情勢緊

<sup>141</sup> 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sup>142</sup>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朴元燾（박원효），《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關於靖難之變的學術史回顧，見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第四章 靖難之變與明朝對外關係之研究〉，頁 71-98。

<sup>143</sup> 王崇武，〈讀明史朝鮮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947），頁 1-25。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脫稿時間係 1942 年，王崇武正在李莊，因此他能夠對讀《明史》、《朝鮮王朝實錄》。時間地點的線索見此文之末。張存武曾指出，孟森、王崇武、李光濤的幾種研究均出自《朝鮮王朝實錄》，見張存武，〈民國以來的中韓關係史研究〉，頁 918。

<sup>144</sup> 李光濤的成績已如前述，現在較少被提及的是王崇武，見王崇武，〈李如松征東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948），頁 343-374。

密相連。

中研院史語所掌握《朝鮮王朝實錄》，不啻成立一個研究朝鮮議題的中心，當時起意研究相關議題者惟盼史語所提供方便。1948年，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任賀昌羣（1903-1973）曾開立介紹信，懇請史語所同意該系學生沈仲常（1921-2000）參閱朝鮮實錄。<sup>145</sup>當時中國僅此一套，抗戰勝利後，北平圖書館便不斷去信史語所，望能歸還。<sup>146</sup>1948年10月，傅斯年一方面同意歸還，一方面想方設法再購一套，他在寫給中研院總辦事處的公函表示：

本所現藏之《朝鮮實錄》一書，國內只此一部，本所係借自北平圖書館者。現北平圖書館屢催本所歸還，但本所第一組需要此書參考，故擬向日本設法覓購一部。此書所需之外匯或國幣亦須請貴處另籌，不由本所三十八年度事業費中交付。<sup>147</sup>

傅斯年的這封公函，證明當時史語所第一組（歷史組）的研究員如李光濤、王崇武，需要此書參考。<sup>148</sup>因為所費不貲，更須請總辦事處另籌款項，購買《朝鮮王朝實錄》。不過因為時局動盪，史語所終未歸還北平圖書館。<sup>149</sup>

中研院史語所播遷臺灣後，李光濤憑藉朝鮮實錄繼續研究明清史、中朝關係史。對於1950、1960年代的研究者而言，治明清史需參閱朝鮮實錄已是常識，或者說是他們師長輩行之有年的方法。<sup>150</sup>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最早研究滿洲入關前史的研究生之一，張存武在李光濤的指導

<sup>145</sup>「敬啟者，茲有敝所研究生沈仲常研究明初宦官與朝鮮之關係，亟需《朝鮮實錄》參考，希貴所圖書能賜與方便，無任感荷。此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雜 36-62-13。

<sup>146</sup>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雜 36-2（卷宗）。

<sup>147</sup>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京 15-7-5。

<sup>148</sup>1942年，史語所提交中研院的年度報告中亦表示，該所正由李光濤負責編纂明代女真史料，其中就利用朝鮮實錄。「此係彙輯有關整個明朝與女真族所發生之關係之史料所據者為朝鮮實錄及明列朝實錄等書。約兩年可以藏事。由助理研究員李光濤擔任。」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編，《國立中央研究院工作報告》，收入劉桂雲、孫承慈選編，《國家圖書館藏國立中央研究院史料叢編》，冊6（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591。

<sup>149</sup>關於北平圖書館藏《朝鮮王朝實錄》隨史語所來臺，見黃寬重、張斐怡，〈海峽兩岸中韓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國學報》，16（2000），頁7。

<sup>150</sup>例如在臺灣大學任教的吳相湘、李宗侗均有此認知，見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頁151-185。

下，參閱《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撰寫碩士論文，<sup>151</sup>後來成為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的理事長，可以說理所當然。自孟森、李光濤到張存武，明末清初的歷史與朝鮮密不可分。

從本文重建的系譜審視張存武，恰好反轉此前的發展趨勢。張存武在中朝關係史的成就自不待言，兩本專著《清韓宗藩貿易》（1978）、《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1987）仍為今日的學者頻頻徵引；更重要的是，他對清朝的態度並不負面，甚且自承「素不以民國以來專事貶抑滿清的論調為然，覺得在中國歷代各朝中，清代的皇帝學識教養水準齊整，清代武功政事均有可觀。」<sup>152</sup>與乃師李光濤的態度迥然有別。

張存武象徵的是逐漸對清朝改觀的一個世代，畢竟中國史學界自 1930 年代以降，耗費無數精力研究清代禁書、清代史料，對於整體清代史料的質性與規模的理解，遠非 1930 年代的史家可比。換句話說，1960 年代的史家轉而更客觀地評價清代史料，進而從批判的角度使用此類文本，是整個史學界積年成果的影響。再者，與孟森、謝國楨、李光濤等人不同，張存武開始反思朝鮮史料可能產生的問題。

眾所皆知，《朝鮮王朝實錄》採擇眾多文獻而成，其中最為中國史家關注者，莫過於朝鮮使者前往中國的報告書，即今人口中的《燕行錄》。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徵引《柵中日錄》、〈清高宗內禪事證聞〉徵引朝鮮實錄的內容，即此等報告書或其摘錄。張存武指出朝鮮史料的幾種問題，其中第二、第三點為：

二、所紀事時並非全由作者之親見，許多是得自驛卒、舌人不確實的傳聞；山川道路，雖係作者所親履，但其名稱、里數也是聞自商驛舌人，並不確實，我們應用時須加小心。

<sup>151</sup>「我在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時，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光濤先生指導。……為了寫碩士論文，除了唸《朝鮮實錄》、《明實錄》、《清實錄》等基本材料之外，也到史語所看了《天聰實錄稿》等書。」見張存武，《生平絮語：張存武回憶錄》（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五章 我的「韓國研究」行腳〉，頁 208。張存武的碩士論文為〈清天聰時代後金汗國與朝鮮的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57）。

<sup>152</sup>張存武，〈編者序〉，收入趙中孚，《近世東三省研究論文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頁 2。



三、有些紀事並非聞見之作，而係輾轉抄錄前人者，其史料價值甚微。<sup>153</sup>

此為中文世界首次反省朝鮮史料可能的問題，改變此前片面信任朝鮮記述的認知。以張存武為對照組，1930年代懷疑清代史料的焦慮已然消散，作為研讀《朝鮮王朝實錄》的第三代學者，張存武更多的是對朝鮮史料的警覺意識，盡量中立地運用明清與朝鮮的史料，<sup>154</sup>在其世代，明清史也與中朝關係史逐漸分流。最後，「朝鮮」進入中國第一代明清史家的典範，在1960年代出現轉折，明清史的「朝鮮話題」逐漸派生出「純粹的」中朝關係史、韓國史研究。

## 結語

1924年5月24日起，章太炎連發數封信函給弟子吳承仕，討論正在草就的《清建國別記》。章太炎一方面像是史料行家，直言清朝官書之欺人，堅信清人喜改明人書，明人書必以明版為可信。章太炎擔心四庫本的《明一統志》不可靠，徐鼎的《小腆紀傳》則「據清人刪改之書，殊不足據」；<sup>155</sup>另一方面卻表示無法釐正清朝先世的史事，也承認無明證回答王杲（1515-1575）與愛新覺羅家族是否同族。<sup>156</sup>顯然章太炎的「裝備」不足以應付這項課題，他當時仰賴的是《明實錄》，奉若至寶的則是嚴從簡的《使職文獻通編》，連《殊域周咨錄》都見不到。<sup>157</sup>儘管章太炎已經注意到朝鮮諸史，卻不太放

<sup>153</sup>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5（1967），頁41-42。

<sup>154</sup>張存武之後的明清史家如莊吉發，對朝鮮史料便很保留了，參見莊吉發，〈他山之石——朝鮮君臣論盛清諸帝〉，收入莊吉發，《清史論集（十五）》（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頁71-110。惟討論張存武之後世代的研究者，勢必牽涉到另一問題，如西方史家的中外關係史論述 Chinese World Order，以及其他非漢民族史料的崛起，此需另文詳究。

<sup>155</sup>章太炎，《書信集上·與吳承仕·三十三、三十四》，頁424-426。同時章太炎也意識到《明史》有問題，見章太炎，《眉批集·盧象昇《明大司馬盧公集》批語》，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冊18，頁381。

<sup>156</sup>章太炎，《書信集上·與吳承仕·四十二》，頁438。

<sup>157</sup>「明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有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二十四卷，獨此書闕焉，故清抽毀亦不及，世亦無知是書者。（張）溥泉于浙中坊肆得之，以為甚奇，余因撫其外編女真部，參之他書為《清建國別記》。古者稱國史曰寶書，若斯者非真寶書

在心上。<sup>158</sup>

回顧 1949 年以前的明清史研究，《清建國別記》是容易被忽視的開山之作，畢竟章太炎更被視為經學通儒，而不是專業的歷史學者。然而此書著實為吾人揭示一張圖像，上頭滿佈著疑懼清代史料欺人的假設，以及史料不足徵的困境。此番景況是 1920、1930 年代明清史家的日常，他們無法信任清代遺留的文獻，甚且質疑寓目的明代史料盡遭清人改造，不復原本面貌。鄭天挺「清史史料所存者已甚微」的斷語聽來彷彿趣談，卻是當時史家日夜苦惱的課題。這個清朝統治遺留下的歷史問題，締結成一袋高懸眾人的賞金，挑戰者眾，所得者少。史料的困窘逼使研究者窮盡所有，他們將目光轉向日本史家著作透露的域外文獻——朝鮮人著作。

日本的東洋史研究發軔於十九世紀末，很快取得可觀的業績。日本官方懷抱侵略亞洲大陸的野心，意欲盡收朝鮮、滿洲、蒙古諸地，更且直指中國。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轄下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看似單純，其實就是國策推進下的副產品。日本東洋史的朝鮮研究蓬勃發展，奠基於他們與西方史家爭勝的野心，以及侵略大陸的企圖。對當時的日本東洋史家而言，朝鮮本就是研究課題的一部份。

日本學人在滿洲、朝鮮的田野踏查化為文字，本意是論述「滿鮮一體」，卻意外地推進朝鮮史研究的進程。不論如何，從中國史家的視角出發，日本東洋史的朝鮮研究成果，儼然是滿洲入關前史的權威論述。時不時疑懼清代史料的中國學者，邂逅日本史家筆下存寄異域的漢文史料，內外合力的結果，朝鮮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

中國的明清史家自然不滿意僅僅步日本史家的後塵，只能抄錄內藤湖南、稻葉岩吉的發現，他們嘗試蒐羅更多的「武器」。1932 年，北平圖書館想方設法購入《朝鮮王朝實錄》，這一解明清史家之渴，同時開創孟森的研究高峰。稍稍比較章太炎繪製的清朝先世譜系，與孟森重建的世系表，便知兩人

---

歟！儻他日更得《殊域周咨錄》，其取資當更廣也！」這段題記出自國家圖書館藏《使職文獻通編》的前副頁，見〔明〕嚴從簡，《使職文獻通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序刊本）。

<sup>158</sup>「東行之江戶，旁撫朝鮮諸史，不能決。」見章太炎，《清建國別記》，收入《章太炎全集》，冊 7，頁 353。

的落差甚大。<sup>159</sup>孟森根據朝鮮史料，主張清肇祖猛哥帖木兒，乃由始祖布庫里雍順傳至凡察，再傳童揮厚而至猛哥帖木兒。章太炎未見朝鮮史料，其清帝世系與孟森大不相同，最明顯的差異是，章以凡察與猛哥帖木兒為兄弟，將祖傳關係斷為兄弟血親。

尋訪真實的歷程，明清史家需要朝鮮的眼睛。孟森耗盡心力抄錄朝鮮實錄，撰述《明元清系通紀》，此書為其獲致當時學術界的殊榮，同時成就第一批「中朝關係史」學者。李光濤、王崇武肯定不將自己定位為中朝關係史學者，但他們涉入中朝關係史，其實源自本文述及的明清史研究系譜。這既說明「朝鮮」伊始便鑲嵌在「明清史」的結構中，同時解釋 1960 年代的張存武以研究滿洲入關前史起家，此後涉入中朝關係史的合理性。這個始於謝國楨、孟森的「朝鮮興趣」以及他們的研究進路，在 1960 年代後迎來一次反轉：一個相對肯定清朝的世代，挾著對朝鮮實錄的興趣，造就另一典範。今日聽來，張存武質疑朝鮮史料的見解彷彿常識，但從民初的脈絡往下閱讀，實是孤明先發的洞見。

晚近中朝關係史名家輩出，南開大學的孫衛國專研明清史學史，同時關注燕行文獻、域外漢籍，近來重新析論王辰倭亂，並檢討過去相關研究的問題，斬獲甚多；<sup>160</sup>伍躍利用《朝鮮王朝實錄》反省明史研究習以為常的「不征之國論」，<sup>161</sup>創見迭發，蓋皆明清史家利用朝鮮文獻續創之新局。復古乃維新，不同世代面對情狀各異的史學問題，「朝鮮」總會透過各種途徑進入研究者的視界，再造更化，紹述先賢，繼而前行。

本文於 2019 年 8 月 7 日收稿；2019 年 11 月 14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吳元祺

<sup>159</sup>周佳榮整理了孟森的研究成果，製〈清帝世系表〉，見周佳榮，《明清疑案新探——史學家的證言》，〈第二章 清之先世和開國經過〉，頁 36。章太炎製作的世譜見：章太炎，《書信集上·與吳承仕·三十八》，頁 432。

<sup>160</sup>孫衛國，〈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援朝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2018：5（2018），頁 21-37。孫衛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對萬曆援朝之役的歷史書寫〉，《史學集刊》，2019：2（2019），頁 15-23。

<sup>161</sup>伍躍，〈外交的理念與外交的現實——以朱元璋「不征國」朝鮮的政策為中心〉，《明史研究》，11（2010），頁 26-54。

本文最初的構想 2018 年 7 月 13 日報告於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學人講座。2018 年 9 月 14 日復以〈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研究者的視界——以臺灣學界為中心〉為題發表於韓國釜慶大學舉辦的研究生論壇「近代東北亞海域人文網絡的近代契機與基礎」。2019 年 7 月 13 日在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以〈「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中心〉為題再次報告。三次報告期間，蒙與會師長、同學提供寶貴意見，投稿後得到審查人的斧正，特此一併致謝。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明〕嚴從簡，《使職文獻通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序刊本。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劉桂雲、孫承蕊選編，《國家圖書館藏國立中央研究院史料叢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 二、檔案資料

《李朝實錄抄錄事業助成李朝實錄抄錄事業助成 池内宏 自昭和八年至昭和十三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編號：H-6-2-0-3\_009。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編號：元 360-12、元 360-15。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京 15-7-5。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雜 36-2（卷宗）。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編號：雜 36-62-13。

### 三、近人論著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2（1997），頁 93-132。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修訂版）。

- 王崇武，〈讀明史朝鮮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947），頁 1-25。
- 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 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北京：中國書店，1999。
- 王維佳，〈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之編纂與價值〉，《史學月刊》，2015：6（2015），頁 15-24。
- 王鍾翰，〈四庫禁燬書與清代思想文化普查運動〉，收入何齡修、朱憲、趙放編，《四庫禁燬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8-27。
- 伍躍，〈外交的理念與外交的現實——以朱元璋「不征國」朝鮮的政策為中心〉，《明史研究》，輯 11（2010），頁 26-54。
- 朱希祖，〈後金國汗姓氏考〉，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冊上，頁 19-64。
- 朱希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牟潤孫，《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增訂本）。
- 何烈，〈六十年來之清史稿與清史〉，收入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史學》，臺北：正中書局，1974，頁 453-515。
- 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漢學研究》，16：1（1998），頁 155-184。
- 何齡修編，《孟心史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8。
- 吳光，《古書考辨集》，臺北：允晨文化，1989。
- 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編，《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頁 151-185。
-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
-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吳晗，《吳晗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宋晞，《中國史學論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4。
- 李光濤，〈李如松征東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948），

頁 343-374。

李光濤，〈記李氏朝鮮實錄〉，收入董作賓等編，《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頁 137-150。

李光濤，《中韓民族與文化》，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周佳榮，《明清疑案新探：史家的證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8。

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6。

孟森，《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

孟森，《清朝前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

孟森，《孟森遺稿彙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

林同濟，〈書評《滿洲發達史》〉，《政治經濟學報》，4：3（1936），頁 659-664。

林志宏，〈內藤湖南與「滿洲」的文獻蒐集事業〉，《地域文化研究》，2（2017），頁 74-8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

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二十年略史》，大連：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1927。

胡適，《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胡適著，鄭群譯，〈新發現的有關中國歷史的材料〉，收入王育濟主編，《中國歷史評論》，輯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50-54。

孫衛國，〈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援朝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2018：5（2018），頁 21-37。

孫衛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對萬曆援朝之役的歷史書寫〉，《史學集刊》，2019：2（2019），頁 15-23。

徐麗華、李德龍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張存武，〈清天聰時代後金汗國與朝鮮的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

- 士論文，1957。
-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5(1967)，頁41-42。
- 張存武，〈民國以來的中韓關係史研究〉，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中冊，臺北：臺大出版組，1992，頁915-930。
- 張存武，《生平絮語：張存武回憶錄》，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
- 教育部編，《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研究專題概覽》，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
- 梁啟超、胡適，《梁任公胡適之先生審定研究國學書目》，上海：亞洲書局，1923。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習之編，《吳晗年譜：著述篇》，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7。
- 莊吉發，《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 莊吉發，《清史論集（十五）》，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 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
-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 黃寬重、張斐怡，〈海峽兩岸中韓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國學報》，16(2000)，頁1-24。
- 傅佛果(Joshua A. Fogel)著，陶德民、何英鶯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 鈔曉鴻，《明清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 葛兆光，《何謂「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 趙中孚，《近世東三省研究論文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 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
- 稻葉岩吉著，楊成能譯，《東北開發史》，北京：辛未編譯社，1935。
- 稻葉岩吉著，但燾譯，《清朝全史》，上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復刻上海科學院圖書館藏本，2006。



- 蔡長廷，〈日本對北亞史的研究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6。
- 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臺大歷史學報》，20（1996），頁 1-18。
- 鄭天挺，《探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
- 蕭一山，《清史》，臺北：華岡出版公司，1980。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9。
- 霍明琨，《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
- 謝剛主（國楨），〈朝鮮李朝實錄纂修述略〉，《中德學誌》，5：4（1943），頁 633-660。
- 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謝國楨，《謝國楨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
-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7。

#### 四、外文論著

-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岸本美緒編，《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3-54。
- 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
- 今西春秋，〈孟森氏の訃〉，《東洋史研究》，4：2（1938），頁 158-160。
- 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
- 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編，《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1976。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69-1971。
- 毛利英介，〈満洲史と東北史のあいだ：稲葉岩吉と金毓黻の交流より〉，《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8（2015），頁 343-363。
- 朴仁鎬（박인호），《한국사학사대요（韓國史學史大要）》，首爾：以會文化社

- ，2001。
- 朴元熿（박원효），《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
- 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 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2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
- 寺内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内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合著，《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東京：刀水書房，2004，頁19-61。
- 杉山清彦，〈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2008），頁347-372。
-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 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原覺天，《滿鉄調査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
- 桜沢亜伊，〈「滿鮮史観」の再検討——「滿鮮歴史地理調査部」と稻葉岩吉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会文化研究》，39（2007），頁20-36。
- 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東京：勁草書房，1969。
- 旗田巍，《戦後における日本の朝鮮史研究》，東京：「朝鮮問題」懇話会，1977。
- 梶村秀樹著作集刊行委員会・編集委員会編，《朝鮮史の方法》，東京：明石書店，1993。
- 窪寺紘一，《東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
- 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
- 稻葉岩吉，《滿洲發達史》，東京：大阪屋號出版部，1915。
- 稻葉岩吉，〈予が滿鮮史研究過程〉，收入稻葉博士還曆記念会編，《稻葉博士還曆記念滿鮮史論叢》，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38，頁1-28。
- 韓永愚（한영우），《한국민족주의역사학（韓國民族主義歷史學）》，首爾：一潮閣，1994。
- 礪波護，〈東洋史学と世界史学〉，收入板垣雄三編，《世界史の構想》，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頁33-49。
-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 How “Choson” Entered the World of Ming-Qing Historians

Wu, Cheng-wei\*

This article fills a gap in Ming-Qing historiography by discussing the first encounter that Chinese Ming-Qing historians had with Choson Korea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ng-Qing historians in China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oson materials in the 1920s. Important pioneers in the field, such as Meng Sen (孟森), Wu Han (吳晗), and Li Kwang-tao (李光濤), devoted themselves to reading and researching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Choson Dynasty* (*Chaoxian wangchao shilu*).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Chinese historian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hoson materials in the 1930s because of two key factors: the problems that persisted in Qing historiography;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historians of East Asia. This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brought Choson Korean materials to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Ming-Qing historians.

This article firs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Qing dynasty, under which the government deployed various methods to compel scholars to abide by official constraints on their research. This legacy led Ming-Qing historians in the 1930s to doubt the credibility of Qing-era historians, to the point that they lamented the paucity of reliable Qing history data.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historians had begun to mak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the study of Choson Korea.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se Choson materials first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through Japanese scholarship, in the absence of reliable Qing historical material. The use of Chos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y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enabled these historians to pose challenging new research questions, and led to the creation of Meng Sen's masterpiece,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Yuan, Ming, Qing xi tongji*). Lastly, this article reviews development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60s, showing how Ming-Qing historians have viewe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oson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 Historians on Ming-Qing Dynasties, Choson Historical Materials, Meng Sen, Inaba Iwakichi, *The Complete Qing History (Qingchao quanshi)*

---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